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 公共外交研究

路 静◎著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是典型的“低政治”领域的社会文化交流活动
也是民族国家或政府借此开展公共外交的政治平台
在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今世界
它正不断凸显出其独特的作用

时事出版社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 公共外交研究

路 静◎著

时事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公共外交研究/路静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195-0188-4

I. ①大… II. ①路… III. ①运动竞赛—外交—研究
IV. ①G81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0568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9.5 字数: 150 千字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2)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5)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14)
第一节 基本概念	(14)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19)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议程	(38)
第一节 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公共外交	(38)
第二节 大型体育赛事筹办的公共外交分析框架	(50)
第三节 研究问题及研究重点	(53)
第三章 韩国筹办汉城奥运会	(56)
第一节 汉城奥运会的筹办背景	(56)
第二节 汉城奥运会的申办	(59)
第三节 筹办初期的汉城奥运会	(69)

第四节	举办地危机应对·····	(73)
第五节	国内危机与奥运会筹办·····	(76)
第四章	韩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奥运会筹办互动·····	(89)
第一节	国际奥委会对汉城奥运会的认识·····	(90)
第二节	国际奥委会与韩国政府的公共外交协作·····	(93)
第五章	大型体育赛事的公共外交新趋势·····	(100)
第一节	经济效益与大型体育赛事的公共外交·····	(100)
第二节	科技进步与大型体育赛事的公共外交·····	(105)
第三节	全球一体与大型体育赛事的新兴参与者·····	(112)
第六章	大型体育赛事的公共外交启示·····	(118)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	(118)
第二节	建议与展望·····	(124)
参考文献	·····	(126)
附录	·····	(145)

绪 论

大型体育赛事是人类高水平运动的竞技场，也是民族国家等行为体向国际社会展现其独特身份、实力或思维的秀场，是各国或政府“公共外交”的平台，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作为一个“低政治”领域，国际体育赛事的政治性虽然不像政治、军事、安全事务等涉及国家生存、安全 and 发展的“高政治”领域那样受到学者和决策者的关注，但是体育赛事的政治运作问题、特别是在国际政治当中的特别角色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奥运会、世界杯等重大的体育赛事中，体育赛事趋于成为国际政治角力场，其国际政治意义越来越明显。

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许多国家或政府曾经借助体育赛事来宣扬本国的文化、表达身份的认同，寻求广泛的合作、改善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同样，赛事组织机构也在不同国家间复杂的政治角力中得到抑制或拓展。然而，在借助大型体育赛事实现上述政治目标时，究竟哪些行为体成为其中政治运作的主角？它们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采取了怎样的公共外交行为？这些行为和互动是在怎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实施的？它们如何使得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政治化？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作为“低政治”平台的国际政治与外交的意义又是如何？对于这些具有国际关系学

术和政策意义的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

由于在国际社会的政治互动中，各行为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形象，往往会给自身的最终行为找出各种理由，这使得研究者很难透过最终的结果理解背后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因此，以国际关系的理论为指引，合理利用一些最新公布的原始档案及相关文献，不失为更全面深入理解大型体育赛事背后的政治运作和内在逻辑的有效研究方式。而近期解密的有关 1988 年汉城奥运会^①的一组历时性记录为遵循该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提供了契机。

1988 年汉城奥运会是冷战期间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同时又是在连续三次大规模抵制奥运会后世界主要国家基本都参加的一届奥运会，使得这届奥运会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各国政府的相关机构和人员与国际奥委会经过大量的沟通、协调、妥协和斗争才使得奥运会得以顺利举行，这使得这届奥运会的政治色彩特别鲜明。

在一个趋于高度一体化的国际社会，针对单独国家的割裂描述和探讨已难以满足复杂国际环境中对国际事件的分析，采取综观的视角，尝试结合国家、国际格局和个体的互动来进行研究，则具有国际关系的学术和政策意义，而以汉城奥运会筹办为例，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国家间围绕大型国际体育赛事通过“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所形成的政治互动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目的

国际关系的研究通常是以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政治争端、

^① “汉城”是韩国首都首尔（“서울”）在 2005 年之前的汉语旧译。2005 年 1 月，该市时任市长李明博正式宣布“서울”的中文译名改为“首尔”，并通知中国政府。由于本书所关注的第 23 届奥运会是在 1988 年举办的，因此依据专有名词翻译中“约定俗成”的准则，采用了“汉城奥运会”的译法，以保持其历史特征。

冲突、战争作为研究的对象或实例，从而形成体现国际关系规律的假设抑或理论。本书意在避开国际政治角力的正面战场或“高政治”（High politics），从国际大型活动，特别是奥运会这类国际体育文化盛宴，或称之为“低政治”（Low politics）平台，来展现各国际社会行为体（国家、国际组织、个人）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复杂互动。

研究选择韩国^① 1988 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研究对象，依托近期解密的相关历史档案与文献，采用历史叙事等方法，以期全面描述韩国政府筹办汉城奥运会的公共外交运作和与相关行为体政治互动的过程，深度分析影响和制约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进一步解释公共外交在围绕大型国际赛事这一“低政治”平台上发挥作用的行為轨迹和内在逻辑。

本研究采取的历史叙事方式，具有内在的叙事逻辑（descriptive sequences）。该逻辑可具体表述为：以特定理论或核心观念为指引，依托既定的假设和解释框架对历史事件嬗变的书写。历史事件的多元性决定了不同群体对其的不同描述和解读，历史叙事的方式实则代表了研究者检视与思考问题的智识图景和对历史事件的重构模式。

作为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的个案研究，本书包含了三个研究目的。

首先，鉴于 1988 年汉城奥运会是 20 世纪冷战环境中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本书在对赛会筹办进程中的公共外交进行阐述过程

① 本研究在叙事过程中，对于“대한민국”（Republic of Korea, ROK）和“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的中文译名，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当前规定的“韩国”和“朝鲜”的译法。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新闻媒体常将“韩国”以“南朝鲜”称之，因此，当后文出现对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相关报道等的直接引用时，仍保留报道原文中“南朝鲜”的称谓方式，而其他场合则采用外交部统一标准。

中，试图通过对特殊背景的分析探讨冷战的国际政治背景（context）与是次奥运会在政治层面的关系。

其次，由于公共外交强调的是通过积极有效的与国际公众的互动以影响其态度、认知和相应国家、政府的政策行为等，本书试图形成一个适合大型体育赛事的公共外交行为分析框架，分析韩国政府在汉城奥运会筹办过程中如何针对国际奥委会与相关国家和政府进行公共外交以实现其对举办奥运会赋予的政治目的，并检验其合理性。

第三，尽管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为历史叙事和分析的方法，但试图借鉴冷战“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的视角，在探讨“国与国”（state to state）关系的同时拓展对“国与社会”（state to society）甚或“国与大众”（state to people）、“国与文化”（state to culture）关系的描述和分析。

二、研究意义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是典型的“低政治”领域的国际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也是民族国家或政府借此开展公共外交的政治平台，但国际关系学界当前对该议题的探讨仍极为有限。

本研究通过对1988年汉城奥运会筹办进程中公共外交决策和运作以及与国际奥委会和不同国家或政府政治互动的研究，在学术层面上意在揭示冷战后期大国之间的竞争从“高政治”领域进一步向大型体育赛事等“低政治”领域延伸的现象，为冷战国际史研究向80年代拓展提供了可能。

在理论层面，研究力图阐释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筹办中的公共外交在促进国际社会“高政治”与“低政治”的互动中发挥了特定的作用。

在方法层面，本书期望验证入江昭等学者所倡导的以国际史思

维为指引，将国际关系理论纳入其中进行深度个案研究的方法是可行的且有意义的。

此外，研究的结果在外交实践中有助于揭示大型体育赛事的政治化及其间复杂的互动，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或政府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为政府在大型体育赛事或相关活动中的行为决策提供借鉴和指导；同时，文章基于理论分析所形成的针对大型体育赛事筹备的公共外交分析框架，也包含一定原创性，可作为民族国家或政府，特别是非大国的国际社会行为体借助体育赛事等“低政治”文化交流活动实施公共外交的行动指南。

第二节 研究方法 with 主要创新点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定性或质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的方法。该方法意在通过非统计程序或其他量化方法来获得研究发现的任何类型的研究，它虽然不排斥对部分数据的量化处理，但研究以诠释性的分析为主。^① 质性研究通常遵循归纳逻辑 (inductive logic)，开放性地探究研究问题；它强调资料的丰富、多元和详尽；重视社会语境和事件过程的呈现；个案研究较多；对研究结果的叙述主要为文字描述。

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并不预先设定可操作性的变量，而是在研究进程中逐步明确研究焦点、形成概念架构；它偏重于文化和现象学的探讨，是一种对社会现象更为整体和深入的理解过程，研究通常比较耗时。由于质性研究中的诠释者是具有主观性的研究者，因此常受到量化研究中所强调的信度、效度问题的质

^① Juliet Corbin and Anselm Strauss,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4.

疑,研究者需要重视收集适切数据、整合多种方法、不断稽核数据,避免先入为主,以数据为依托进行低推断性叙述,提升诠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①。

国家能够成功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涉及复杂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大众”“国家与文化”的互动。研究现象本身难以简化的特性适宜采用质性方法进行理解。具体而言,本书在历史叙事过程中采用的研究方法包含了(但不限于)深度个案分析、历史分析以及话语分析等方面。

1. 深度个案分析(in-depth case analysis)

深度个案分析是本研究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个案研究是社会科学主题的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式,其研究的主体是有界限的系统。麦瑞尔姆(Sharan B. Merriam)指出,“个案具有特定、描述和启发性三项特征。特定性是指个案研究探讨的是特定且有范围的现象;描述性是指个案研究的报告会对现象做丰富而厚实的描述;启发性是指个案研究报告能让读者对现象有更深入的理解,从中发现它的意义,扩展他们的经验。”^②

依据研究目的,个案分本质型(intrinsic)、工具型(instrumental)和集体型(collective)三种。^③ 本研究所采用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个案属于工具型个案。要对历史事件追根溯源或至少能够尽量深入地分析,需要花费时间参照事件发生时期原始的资源,这其中包括以各种介质保存的原始文件,也包括当事人传记

① 详见 Joseph A. Maxwell, “Understanding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 62, No. 3, 1992; John W. Creswell,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12 等。

② Sharan B. Merriam,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in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p. 26-43.

③ Robert E. Stake, *The Art of Case Study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5, p. xi.

等相关出版物^①。本研究即力图依托相应原始资源，以汉城奥运会的筹办这一政治意味鲜明的事件为个案，深入探究国际大型活动中诸多行为体的互动，发现可能被忽略的过程细节和意义。

2. “国际史”分析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alysis)

尽管采取历史叙事的方法，本研究倾向于遵循“国际史”的研究指导，首先强调对多国、不同语言历史数据的充分收集和对比利用，其次着重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大众、国家与文化”的互动分析，从而全面描述这场由诸多行为体共同参与和促成的国际大型盛会。

与历史类文献通常采用的以时间顺序从单一国家角度进行描述的国别研究不同，“国际史自从 90 年代末由美国史学界提出以来，已有近 20 余年的历史，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是其最大的特点”^②。在全球化不断推进以及国际关系研究出现对象和方法危机的双重触动下，外交学，特别是公共外交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国际史”的思维理念被相应提出。哈佛大学国际史教授入江昭 (Akiya Iriye) 是该转向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其日、美文化结合的特殊身份使其在历史研究中能够摆脱当时多数学者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传统，依托多国档案，即“国际史”的思维，在权力视角之外还从文化视角分析外交史。他提出“在国际关系领域，所谓文化可以被定义成交流，从文化视角分析国际关系，关注的是国家内和国家间的交流”，即“从梦想、期望以及其他一些人类观念的表征方面分析国际事务”。^③ 在其对中美日关系史的诸多探讨中，他力图对导致战争和冲突的多方因素进行全面的梳理，

① Marc Trachtenberg, *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 Guide to Metho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0 - 168.

② 徐国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2012 年第 5 期，第 5 页。

③ Akira Iriye,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7, No. 1, 1990, p. 99.

他认为不能仅从权力的争夺、经济的相互依赖的二分角度来探讨冲突或和平的问题，现实当中还需考虑“信仰”的情况，他注意到“选择追求权力或强调经济利益，取决于对文化以及文化是世界的关系持有何种假设”^①。他认为文化方面的因素虽然不能在最初阻止战争的发生，但却是战后双方能迅速和解达成共识走上发展之路的基础。他提出对外交史进行文化解读时要统筹考虑文化基础、文化交往和全球意识三个方面。在他看来，“国家既是一个权力体系、一个经济体系，也是一个文化限定的实体，是由拥有共同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的人构成的，尽管个体会有观点、期望的差异，但一些‘伦理—想象内核’或称为核心价值是与别的国家不同的”^②。因此，国家间的理解和敌对不仅仅要考虑安全、贸易问题，还需要考虑人们观念模式的不同。他也提倡超越国界去关注自由、人权、环保等全球关注问题。在入江昭看来，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并非唯一，历史认识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但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要有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努力寻求共享历史。张曙光在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探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入江昭的研究，他认为“入江昭通过分析美国20世纪频频介入国际（特别是东亚）冲突的渊源，提出文化——主要表现为代代传承的价值体系（values）、信念（beliefs）和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应是除权力和经济之外驱动国际冲突、解决冲突行为的第三大动力，因而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分析范式”^③。本研究依托国际史的视角，以期深化对

①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ol. 89, No. 1, 1989, p. 6.

② Akira Iriye,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7, No. 1, 1990, p. 101.

③ 张曙光：《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连结——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13页。

汉城奥运会背后公共外交运作中各影响要素更为细致、全面的解读。

本研究的材料搜集选择了以核心语料为依托,在细读的基础上不断以核心语料为议程指引,逐步拓展的方式进行。

本研究最核心的原始档案资料(primary documents)有三个:其一是新近解密的由国际奥委会保存的关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源文件(HPPPD),时间跨度为1983年8月19日至1988年9月10日。这批解密的档案共65份,包含是次奥运会的情报、报告、通信以及会议记录等,是“朝鲜国家档案项目”(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NKIDP)的部分成果,由多国学者共同合作完成。其二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官方报告(上卷)^①(Official report: Games of the XXIVth Olympiad Seoul 1988, vol. 1)。依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奥运会结束后主办方需要提交一份详尽的报告留存。汉城奥运会的官方报告分上下两卷,与本研究关联的上卷介绍了大赛完整的组织和规划过程^②,共864页,图文并茂,是从韩国视角审视本届奥运会的一手资料。同步搜集的还包括《奥林匹克宪章》^③1979—1989年版以及最新的2015年版。其三是最新公布的美国政府外交关系档案(FRUS)。该系列数据由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负责整理,汇集了美国政府主要对外

① 汉城奥运会的官方报告有英语、法语、朝鲜语三种语言版本,本研究参考的是英语版。报告分上下两卷,上卷关于组织和规划,下卷是竞赛概述和成绩结果。

② 该官方报告上卷共32章,包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Award of the Games of the XXIVth Olympiad)、赛事组委(The Seoul Olympic Organizing Committee)、政府支持与民众参与(Government Support and People's Participation)、国际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安全(security)等详尽的记录。

③ 《奥林匹克宪章》自产生以来就在不断修订完善,1979年至1989年间共有十个版本的宪章:分别为Olympic Charter 1979、Modification to the Olympic Charter 1979、Olympic Charter Provisional 1980、Olympic Charter 1982、Olympic Charter 1983、Olympic Charter 1984、Olympic Charter 1985、Olympic Charter 1987、Annexes to the Olympic Charter 1988、Olympic Charter 1989。

政策决定和外交关系的官方记录。本书参照的是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公共外交档案以及里根总统 1986 年 10 月至 1989 年 1 月的对苏关系档案。

在使用最新解密的原始档案的同时,本研究也尽最大可能收集了“第二手”资料。首先,参与者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传记,包括:朴世直所著《我策划了汉城奥运会》;庞德(Richard W. Pound)的《五环降临韩国:1988 年汉城奥运会背后的秘密谈判》(*Five rings over Korea: the secret negotiations behind the 1988 Olympic games in Seoul*);文森特·勒孔特著,张秀萍、张庆文译《汉城奥运会内幕:1988 年奥运会申办和筹备纪实》;萨马兰奇(Joan Antoni Samaranch i Torelló)著,孟宪臣译《萨马兰奇——奥林匹克回忆》;米勒(David Miller)著,梁丽娟译《萨马兰奇与奥林匹克》;周阿堡所著《萨马兰奇传》;以及窦应泰所著《卢泰愚传》。其次,考虑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方面为国际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本研究参考的新闻报道的媒体包括: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79—1989),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1979—1985),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1979—1989),中国《人民日报》(1979—1989)以及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1979—1989)。

3.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在本书的个案探讨中,基于档案数据客观的“叙述”贯穿始终,是呈现和解释本研究目标的主要方式。档案、文献、记录等都是语言形式呈现的话语(discourse)。通常认为,话语包括会话(conversation)和文本(text)两类,是人类言语表达、行动、思考、感觉和价值观的综合体。本研究力图在采用个案研究和国际史研究方法的同时辅以“话语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的补充。

批评话语分析兴起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在使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文学以及其他形式话语过程中发展而成的一种语言研

究方法。与同时代主流语言学非历史（ahistorical）的、自治（autonomous）的、以句子或小句为研究重心的高度形式化、结构化的语言研究不同，批评话语分析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认为语言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①。目前，批评话语分析的理念和方法也为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学科所接纳和使用。

在批评话语分析中，“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中性概念，泛指特定社会制度中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该分析传统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会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ideological-discursive formations），暗含着话语主体在社会环境中特定的权势、地位关系^②。换言之，语言用户所使用的语言系统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群体的语言习惯基础之上，展现出阶级性、地区性、机构性等差异。依此，可以做出基本假设，即在汉城奥运会问题中，主要参与方在语言表达方面也难免会呈现各自意识形态特征。汉城奥运会的档案记录当中，包含来自不同行为体的报告、信件，这些文本从各行为体自身视角出发阐明了特定观点、意见、态度，一些单独成文，一些是多个回合的交流记录，或称交互文本，都可以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通过话语分析，可以从微观层面更为细致探究文字背后的深层意涵、增进对是次奥运会各行为体互动叙述的客观性。

① 丁建新：《叙事的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模式》，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② Roger Fowler, Bob Hodge, Gunther Kress and Tony Trew,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Norma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1995.

二、主要创新点

本研究的创新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第一，探索了国际关系中研究“低政治”的视角。体育活动的“低政治”性使得其中的政治行为以及蕴含的研究价值容易被忽略。本研究以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前不同规模的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的公共外交互动为研究视角，探讨国际大型活动筹办过程中以隐蔽方式展现的国际政治角力。在体育赛事的举办中，事件的主角是主办国，国际体育组织、利益相关国家和大国在其间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使用了新近解密的汉城奥运会相关档案、美国外交档案和多国文献。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不能简单地从各国或政府行为的结果参透其背后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本书在研究中参阅的源文件资料是近期解密的汉城奥运会的一组历时性记录以及美国政府外交关系档案中美苏关系档案；同一时间都有多方（包括中国、美国等）第二手文献（包括当事人回忆、媒体报道与评论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等）作为参照，契合了“国际史”研究的倡导，以期最大限度地排除研究中虚假因素的影响，揭示各国行为背后接近现实的真正原因。

第三，本研究虽是以个案的形式进行的，但叙述和分析并非满足于国别分析，而是力图兼顾宏观层面的国际体系、中观层面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人，在融合三个层级的互动叙述中，以综观的图景对个案进行更为全面的呈现和诠释。特别在分析公共外交如何指导、协调和促进“低政治”和“高政治”的互动方面，本书整合了相关文献以及国际关系三大研究范式与公共外交相关的理论和假设，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以期描述和解构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对外传播及多边沟通等政策行为。